



窟石岡云

云冈石窟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编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

文物出版社

1977年 北京

云冈石窟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7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2开 印张：12

书号：7068·632

定价：6.00元

云 冈 石 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称作武州塞。州，一作周）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可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东部四个窟（1—4窟），中部九个窟（5—13窟），西部四十个窟（14—53窟）；此外还有许多小窟。共计一千一百多个小龛，大小造像五万一千多个。它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

大同是我国北方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大同属于赵国云中郡。秦始皇统一中国，仍属云中郡管辖。汉代在这里设置了平城县。武州塞位于我国内外长城之间，是汉与匈奴间的交通要道。《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

拓跋氏是我国古代北部地区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支，他们的游牧地区原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公元一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分裂，拓跋鲜卑由东北向西南迁移。西晋以后，在各部族之间的长期割据混战中，拓跋氏的势力日益壮大，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从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境内）迁都平城，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又从平城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封建统治的中心近一百年之久。云冈石窟即是在北魏王朝的中期开凿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当时的黄河流域，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各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以一个还处在奴隶社会早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鲜卑贵族集团，要统治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广大汉族人民，自然会发生许多困难。为了巩固已经建立的政权，鲜卑贵族统治集团不得不尽力争取汉族上层地主的支持与合作。北魏王朝就是这样一个以鲜卑贵族为主、汉族士族地主为辅的统治集团的联合政权。

云冈石窟的开凿，是北魏时期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北魏统治阶级残酷地奴役和剥削各族劳动人民，“富者兼并山泽，贫者望绝一廛”（《魏书·孝文纪》）各族劳动人民处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苦难之中。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五世纪中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不断奋起反抗，起义的烽火遍及中原和北方。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聚众十万，吸收许多汉人和少数民族到起义行列中，沉重打击了北魏统治集团。对于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北魏统治集团在残酷镇压的同时，日益乞灵于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作为禁锢劳动人民头脑的精神枷锁和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云冈石窟也就成为抬高拓跋皇帝政治地位，巩固鲜卑贵族特权利益的重要工具。

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两地间来往频繁，武州塞正当交通要冲。北魏皇帝自明元帝始，曾先后七次到武州山祈祷，这里成为统治集团祈福的“神山”。云冈石窟就选择在这里，形成都城附近的佛教“圣地”。

道武帝拓跋珪一建国，不仅在乎城建立寺院，而且封沙门法果为道人统，领导僧徒。这个法果改变以前“沙门不礼俗”的习惯，带头礼拜皇帝，据记载：“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好一个“当今如来”！原来，帝王就是佛，礼佛就是忠君。不仅如此，就连石窟、佛寺中造像的形体和身样，也都仿照皇帝来雕造。兴

安元年（公元452年）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又在京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自己）铸释迦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魏书·释老志》）云冈石窟现存主要大窟，可以说都是为北魏皇帝开凿的。这是北魏佛教泛滥，佛教艺术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雕塑艺术，是通过佛像雕塑，形象地宣传佛教教义。它可以起到使“观者听，听者悟”，“进可以击心，退可以招劝”的作用，较之艰涩的佛经通俗易懂，往往更具欺骗性，因而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传到中国后必须经过一番改造和修补，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中国儒家传统上就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礼记·祭义》）的主张，佛教宣传轮回、报应等教义，也具有“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魏书·释老志》）的作用，在维护地主阶级专政，解除人民斗志上，二者的根本利益和作用是一致的。而佛教的“升天”骗术和“因果报应”的诡说，儒家的忠孝等封建伦理道德，二者恰好可以互为补充。当时的北魏皇帝，就是既尊孔又崇佛的。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孝文帝“雅好经书……善谈老庄，尤精释义”。就连名噪一时的著名高僧慧远，也直言不讳地承认，释迦与老孔“发致不殊”，“虽曰道殊，其归一也”。

佛教传入中国后，围绕着沙门应当不应当敬王者，教徒出家是不是孝父母的问题，曾展开了长期不休的争论。但在北魏时期，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首先解决了拜佛与忠君的关系，这样，孝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我们从云冈石窟现存造像和题记来看，为“亡去父母，七世父母”作“功德”而开窟造像，已占相当比重；宣扬忠孝的“睽子本生”之类的题材，受到重视；象“忠和著□，□孝并举，子孙兴茂，绍隆家嗣”（第50窟上方《吴天恩造像记》）这样的内容，也并非一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已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在大同郊区发现的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马金龙墓中，同时出土了表现中国传统思想的木版漆画以

及具有云冈中部窟群特点的佛教题材的伎乐、蟠龙等文物，就是一个实物例证。

佛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宿命论。它欺骗人们说，人的神识（灵魂）是不灭的。人的身体死了，精神不灭，可以再生人世；人的生死祸福，都由命运来决定。所有这些，都是用来麻痹诱骗人民放弃斗争并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辩护的。因此，它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格外欢迎。鲁迅批判道：“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应该坠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又主张读经复古，兼作圣贤。他们象活着时候的超出人伦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轮回的。”（《死》）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说教，是贯穿云冈石窟全部内容的基本思想。在云冈石窟中屡见不鲜的“若坠三涂，速合解脱”（第11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九年题记）、“长辞八难，永与苦别”（第11窟东壁太和七年题记）之类的内容以及佛本生故事等，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凉州地接西域，自前凉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公元四三九年，北魏灭北凉，俘掠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造成“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魏书·释老志》）。北魏佛教主要来源于北凉，开凿云冈石窟的基本力量，就是来自凉州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工匠。

凉州佛教的主体是禅法。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义译为思惟修、静虑等。它主张“致用力行”，要人们绝灭一切“妄想”，对一切剥削、压迫造成的不幸和灾难“甘心受之，都无怨诉”，而依靠寂坐禅定，从思想上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露的，宗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在当时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佛教这种培养奴隶性格、消解反抗意志的反动作用，正符合北魏统治集团的需要。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凉州禅师玄高就来到平城，受到太武帝敬重，太子晃事高为师。同时凉州禅师慧崇，是尚书韩万德的老师。文成帝复佛法后，任道人统的师贤和任沙门统的昙曜，也都是著名的凉州禅师。昙曜主持开凿云冈最早五个大窟，也就兼有广聚沙门同修禅定的目的。

1. 北魏窟的分期

云冈石窟现存的主要洞窟，大部是文成帝和平年间（公元460—465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之前的三十多年间开凿的。其余小型窟、龕的开凿，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样式的发展，可分三期：

第一期石窟 太武帝晚期，北魏开始衰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文成帝即位，立即恢复佛教，借以缓和人民的反抗。开凿云冈石窟，目的在于提高皇权。《魏书·释老志》介绍这次开窟情况说：“和平初……县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五所石窟，就是现云冈石窟中第16至20窟。

第一期石窟在形制上的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各窟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和现在佛），主佛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主要位置。

根据主像和石窟布局，这五个窟可分为两组。18、19、20三窟为一组，都以佛装的三世佛为主像。19窟左右两主像分处于东、西耳洞中，是这一组的中心窟。这一组在云冈石窟中开凿的时间最早，但19窟西耳洞的主要工程一直拖到第二期。16、17两窟是另一组。17窟主像也是三世佛，但正中是菩萨装的未来佛交脚弥勒像。16窟主像是单一的释迦立像。这五所石窟，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一像来考虑，16、17窟是从西数的最后两窟。主像是单一释迦像的16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的17窟，相当于没有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18、19、20窟，则应分别相当于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18、19、20三窟基本上按原计划全部完成，而16、17二窟壁面都有较多的第二期甚至第三期补刻的小龕，16窟主像工程更拖到第二期晚期才告竣。

这一期的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菩萨头戴宝冠，身着璎珞，臂上着钏。亦有一些较为高凸的衣纹，似是厚重的毛质衣料。这些，反映了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带）和中亚牧区服装的特点。

昙曜在北魏恢复佛教后，为帝王造窟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为皇室祈福外，也是针对太武帝灭佛前流传的“胡本无佛”的言论，而宣传佛教的渊源悠久。他在云冈翻译自三世佛开始的佛教历史《付法藏传》，也正是与这一工作相配合。昙曜向“以禅业见称”（《高僧传·玄高传》），文献又记载北魏灵岩寺（即云冈石窟）其中可居三千人，东头佛寺可容千人。第一期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千佛，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禅观的主要对象。因此，这些巨大的窟室，很可能是用作禅居的。

第二期石窟开凿于公元四六五年文成帝死后，当时各族人民不断起义。公元四七一年孝文帝即位，江表地区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北魏皇室、贵族崇佛祈福也愈演愈烈。这时云冈连续开凿成组的大窟。这一阶段，具体时间大约自文成帝到迁洛前的孝文帝时期，相当于公元四六五年至四九四年之间。《水经注·漯水条》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逕灵岩南，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大约就是这一期晚期的情景。

云冈第二期的主要石窟有五组：7、8窟，9、10窟，5、6窟，1、2窟，四组都是双窟。另一组三个窟，即11、12、13窟。此外，云冈最大的石窟3窟，主要工程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11窟外壁崖面上的小窟和20窟以西的个别小窟，也是在这一期晚期开凿的。

第二期石窟在形制上的特点是，平面多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还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方形平面窟的壁面雕刻都作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的布局，窟顶多雕出平基。在造像方面，象第一期那样的雄伟大像较少了，但形象题材多样化了，出现了世俗的供养人行列，凸起式的衣纹被简化的阶梯式所代替。和第一期比较，最使人注目的是，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和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

饰日渐增多，佛像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中原的样式。

7、8窟这组双窟，是第二期石窟中最早的一组，大约完成在孝文帝初期。据金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曹衍所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的记载推测，这组双窟为孝文帝所开，辽时即以此为主体兴建了护国寺。以后室后壁上下大龕为准，两窟主像都是三世佛。7窟下龕主像是释迦多宝像。释迦突出了，所以前后室壁面分层分段大面积布置了本生故事浮雕和表现佛传的佛龕。佛装的交脚弥勒、护法诸天和大型供养人行列等，都最早出现在这组双窟内。两窟前室露天，原应覆盖瓦顶。

9、10窟这组双窟，略晚于7、8窟。根据《金碑》，大致可以推定它是孝文帝宠宦钳耳庆时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建，十三年毕”的石窟。辽代在这里兴建了崇福寺。9窟主像是释迦，10窟主像是弥勒，这是云冈第二期出现的新的主像组合。壁面布置了较多的释迦多宝对坐像。

5、6窟这组双窟的主像都是三世佛。这两窟的大型佛像改变了过去的服装，都雕成了褒衣博带式。这种佛装，是当时南朝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服式，而上著帔帛，下著大裙的菩萨装，也是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常服。服装的改变，是和孝文帝实行的各项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始服袈裟”等一系列服制改革措施相呼应的。所以推测6窟完成时，已去孝文迁洛不远。至于5窟壁面布满了没有统一布署、时间又不相同的大小佛龕，更说明它并未按原计划完工，这种情况当然也和都城南迁有关。因此，这组双窟的雕凿，约在孝文帝都平城的后期。两窟工程浩大，雕饰富丽在云冈也以6窟为最，《金碑》推测为孝文帝所凿，辽时建天宫寺的石窟，有可能就是这一组。

东西毗邻的5至10窟这三组双窟，都有双塔一碑（两侧壁前端雕塔，中间隔壁的前端雕碑）的窟前设计。这是说明它们时间接近的最好例证。其中5、6窟和7、8窟两组，窟形巨大，9、10窟窟形较小。联系到窟内主像题材的不同，这些差别应是开窟人身份有高低反映。

11至13窟是一组，具有前后室的12窟是中心窟。12窟前室外部上凿屋檐，前列两

柱，洞开三门，后室入口处上雕明窗。两侧的11和13窟则于窟门上各雕一明窗。这样为12窟布置左右对称的立面布局，显然是有意的安排。12窟在后室后壁分上下龕，上龕主像为弥勒，下龕为释迦多宝。此窟造像服饰与风格接近9、10窟。11窟中心立塔柱，塔柱四面各雕上下龕，除南面上龕为弥勒外，都是释迦立像。窟东壁有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造九十五区石庙形象铭，西壁有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铭龕和服饰接近5、6窟的七佛立像。13窟主像是弥勒，窟内小龕同11窟，延续的时间很长。这一组石窟中，看来只有12窟按原计划完成，而11、13两窟大约在开凿不久即行停工，此后陆续雕凿了不少无统一安排的小龕。

1、2窟是一组塔洞。窟后壁的主像，1窟是弥勒，2窟是释迦。1窟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上层雕释迦。2窟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1、2窟造像形式和风格较5、6窟为早，雕凿时间应在9、10窟和5、6窟之间。释迦多宝对坐塔见于《法华经》，维摩、文殊问答出自《维摩诘经》。北魏重视这两部经，是因为它们是用譬喻故事宣传佛教唯心主义的较好形式，孝文迁洛前后，曾把僧人请到宫中宣讲。明确根据《法华》、《维摩》开凿的1、2窟，其时间也恰好接近北魏南迁。

3窟原为大型塔洞设计，开凿可能在二期，但终北魏一代迄未完成。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间凿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这双塔一窟室应是3窟的一部分，塔的样式和窟室造像，属于第二期的后半。

第二期石窟和龕像的急剧增多，反映了文成帝以后至孝文帝迁洛前这一阶段，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发展迅速。《大唐内典录》所记：“自魏国所统貲赋，并成石龕”的事，主要应是指这一期的情况。据第二期窟龕现存铭记的记载，除皇室外，官吏（如《金碑》所记宕昌公钳耳庆时），上层僧尼（如17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释迦、多宝、弥勒三像龕铭记）和在俗的邑义信士（指信教的一般地主，如11窟东壁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象九十四区铭记）等，都曾在云

冈凿石造像。这表明这时云冈已不限于皇室开凿，而成为北魏都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僧人禅观的对象，这时不仅继续雕凿前期的三世佛、释迦、弥勒，而且雕出了禅观时的辅助形象如本生、佛传、七佛、供养天人等。甚至还按禅观要求，把有关形象联缀起来，如上龕弥勒、下龕释迦。这种安排，正是当时流行的修持“法华三昧观”时所需。可能是“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续高僧传·昙曜传》）的3窟，上部凿出弥勒窟室，下部开凿巨大的禅窟，显然是为了坐禅的需要。至于5、6窟和7、8窟明窗左右刻出的坐禅僧人，更有可能是当时有意树立的坐禅的标准形象。当时的习禅僧人，有的是逃避苛敛，有的是皇室贵族为了给自己作“功德”而度捨，有的是被强迫出家。

第三期石窟是公元四九四年孝文迁洛以后开凿的，当时平城作为北都，仍继续作为佛教要地，尽管大窟减少，但中小窟龕却自东迄西遍布崖面。《金碑》记云冈铭记纪年最晚的是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与云冈现存窟龕情况相符合。

第三期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4、14、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4至6窟间的小窟，大都属于这一期。

第三期的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龕多。洞窟内部日益方整。塔洞、四壁三龕及重龕式的洞窟，是这时流行的窟式。窟门外崖面上出现了雕饰，这种雕饰越晚越繁缛。第二期雕刻中丰富多变的气势减弱了，新形象也出现不多，造型趋于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越来越重叠，龕楣、帐饰也日益繁复。

第三期窟龕，可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4窟，4、5窟间未编号塔洞和51窟，都属于塔洞，正面雕塔或方柱，壁面多雕千佛龕。

14、15窟。14窟内多千佛龕，正壁正面原雕千佛立柱，后壁主像为弥勒。15窟是典型千佛洞，四壁皆千佛，后壁有弥勒龕，东西壁有释迦龕。

四壁三龕式的中小洞窟，约二十余座，如33、35窟等。后壁主像多为释迦多宝，也有只是释迦的。35窟门口有延昌五年（公元516年）小龕，是该窟开凿时间的下限。

四壁重叠式的中小洞窟，约十余座，如26、28窟等。后壁主像多为上龕弥勒，下层释迦。

第三期中小窟龕的数量之多，表明迁洛后的北魏晚期，佛教在平城地区的中下层蔓延起来。现存铭记中记载窟主官职最高的，不过是冠军将军华□侯（50窟上方《吴天恩造像记》），小龕龕主最高的不过是常山太守（11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九年妻周为亡夫田文虎造释迦弥勒龕铭）。没有官职的佛教信徒（清信士、佛弟子等）开凿窟龕较多，大多是为亡者祈冥福，也有的是为生者求平安。值得注意的是，延昌、正光年间的铭记中，出现了愿“託生静土”（4窟南壁正光□年为亡夫侍中平原太守造像铭）和“愿託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19窟西耳洞后壁延昌四年清信士元三造像铭）之类的要求。列宁曾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社会主义和宗教》）北魏晚期净土崇拜流布到云冈，正是当时社会极度黑暗的反应。此外，18窟窟门西壁“大茹茹可敦”的铭记，表明平城佛教，这时已影响到北方的柔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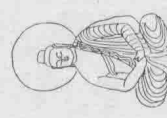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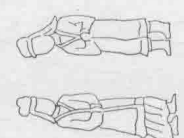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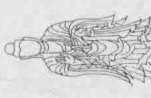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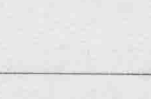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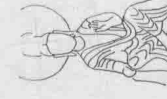


第三期窟龕的形象，进一步向符合禅观的方面发展。上述四种类型中的前两种，即塔洞和千佛洞中，雕出了《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全面内容。而后两种，即四壁三龕式和重叠式窟，则雕出了《禅经》所提出的幻想的主要形象。这种设计，比第二期更主要地是为僧人禅定而安排的，说明云冈习禅的僧人日益增多。文献记载，正光以后，出家僧尼超过二百万，“民多绝户而为沙门”（《魏书·李孝伯传》）。尽管北魏末年统治阶级更加狂热地提倡佛教，强化僧规，但广大的下层僧众，愈来愈多地进行各种反抗，甚至冲破重重枷锁，参加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中来。从孝文帝到宣武帝的四十多年中，由僧徒直接倡导的起义就有八次，其中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由沙门法庆领导的起义，规模较大。这次起义，杀死了阜城令，攻破了渤海郡，还毁寺院、斩僧尼、烧经像，这在我国农民起义史上，是不多见的。当时云冈虽然没有僧人起义的记载，但正光四年（公元

523年)围绕平城的六镇镇民相率起义,起义队伍控制平城达七年。在这样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极盛一时的云冈,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沉寂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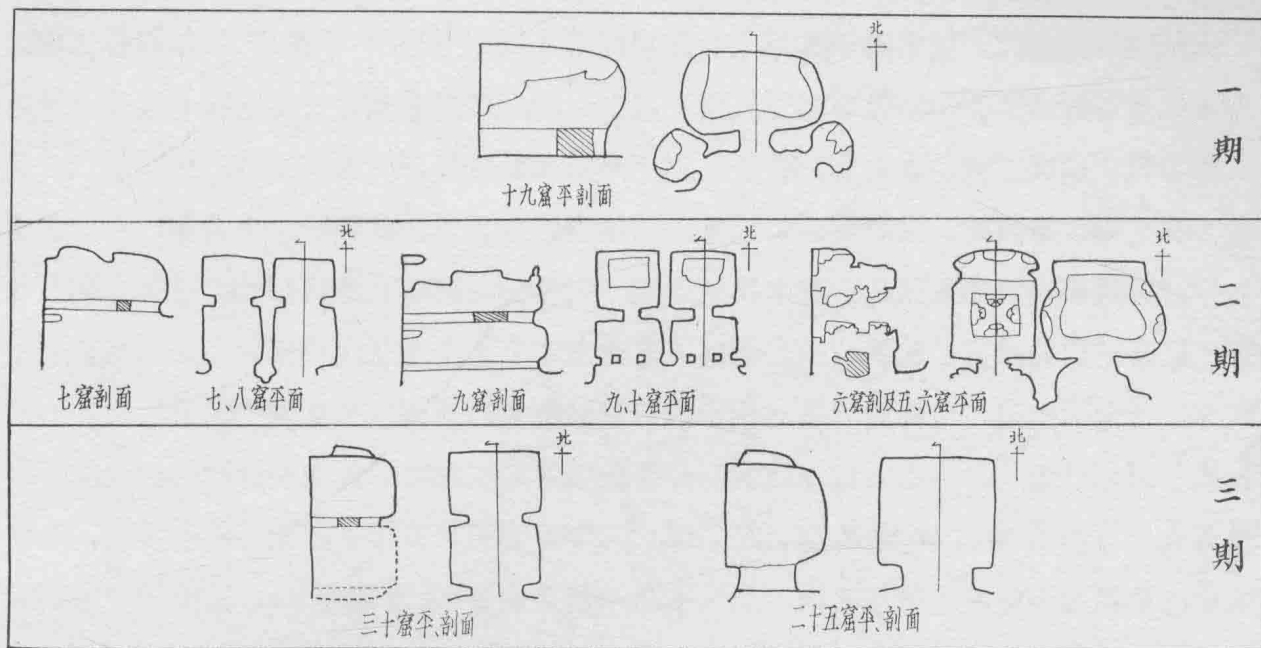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北魏窟分期表

| 类别 期别 | 时代 | 造像特征 | | | | | 窟龕形制 | 题材布置 | 雕造技巧 及纹饰 | 窟龕号 |
|----------|--|----------------------------------|------------------------------------|------------------------|------------------------------|-----------------------------|--|-------------------------------------|-----------------------------|--------------------|
| | | 佛 | 菩萨 | 飞天 | 力士 | 供养人 | | | | |
| 第一期 | 和平初 (460年) — 和平六年 (465年) | 面相方圆,两肩齐深,高鼻。上身内著僧祇支,外著袒右肩或通肩大衣。 | 袒上身或斜披络腋。高宝冠,胸前戴项圈或短缨珞,臂戴钏,下著羊肠大裙。 | 袒上身,斜披络腋,天带飘扬。大裙贴腿,赤足。 | | | 平面马蹄形,穹窿顶,似草庐式。大像占窟内主要位置。 | 主像是三世佛、释迦牟尼、弥勒、菩萨,外壁为千佛。 | 先雕出大的衣褶,再加阴线。厚重的衣纹凸起。 | 16—20窟 |
| 第二期 | 和平六年 (465年) — 太和十八年 (494年) | 面相丰圆,较清秀。三衣出现,前后衣袂式。 | 太和十年出现新式花蔓披身帛,羊肠大裙下飞扬。 | 后期穿短衫,有露足。 | 头戴缨冠,右手持杵,左手持叉。后期出现高髻、轆轳的形象。 | 早期多为“夹领窄袖”束。较晚出现汉族服装。 | 平面多方形,前后室,有的有部立塔柱。窟顶多成组的龕,龕制多样,作上下层、左右对称式。 | 释迦牟尼、三世佛、多宝佛、弥勒、文殊、维摩、供养人、天神、佛本生故事。 | 简化的直式出檐,出现中传统装饰植物。 | 1、2窟,3窟北魏部分,5—13窟。 |
| 第三期 | 太和十八年 (494年) — 正光五年 (524年) | 面型清瘦,长削颈肩。全用袈裟式服装。延昌后,摆为平行线条。 | 面型同佛。上身著短帛交袂,摆齿大呈状。 | 上身著短衫,大露足。折成V形。 | 头戴冠,著袈裟,束高髻,发著大衣。 | 多中,小塔佛洞、千佛龕、四壁龕、三壁龕、四壁龕式四种。 | 释迦牟尼、多宝佛、文殊、维摩、弥勒、供养人、天神、佛本生故事。 | 直平阶式刀纹装饰于梯式纹饰。 | 4、14、15窟,11窟以上西崖面龕,上部小龕以诸窟。 | |

云冈北魏造像分期图

| 类别 时代 | 佛 | | | 菩萨 | | | 供养人 | | |
|--------------------------------|--|--|--|--|--|--|---|--|--|
| | 第一期 和平初—和平六年 (460-465) |  卅窟本尊 卅窟本尊 卅窟背光 |  卅九窟本尊 卅九窟本尊 |  卅窟背光 |  卅窟前凉刻 卅窟前凉刻 |  卅窟前凉刻 卅窟前凉刻 |  卅窟前凉刻 卅窟前凉刻 |  卅窟前凉刻 卅窟前凉刻 |  卅窟本尊 卅窟本尊 |
| 第二期 和平六年—太和八年 (465-494)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卅七窟前凉刻 卅七窟前凉刻 |
| 第三期 太和十八年—正光五年 (494-524)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卅二窟外壁 卅二窟外壁 |

云冈北魏石窟形制分期图



2. 唐代以后的云冈石窟

北魏灭亡后，平城先后属东魏和北齐。北齐废恒州为恒安镇。唐初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置云中郡，治恒安镇，在云冈又开始进行个别的石窟工程。这就是《金碑》中所记：“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守臣重建”。当时，还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古清凉传》）。3窟后室的三尊大像，很可能就是初唐时在北魏未完工的后室塔身南面西侧开雕的。《金碑》所记唐初以来的灵岩寺，大约就指这里。

唐代云冈的情况，《广弘明集》中这样记载：“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龕，容千人……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龕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此外，《文苑英华》中也收录了宋昱《题石窟寺，即魏孝文之所置》五言诗一首：“梵宇开金地，香龕凿铁围。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檐牖笼朱旭，房廊鍊翠微。瑞莲生佛步，宝树挂天衣。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宋昱，杨国忠党，官至中书舍人，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被乱

兵所杀。他到云冈应在天宝末年以前。

《金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公元1049年）母后再修……清宁六年（公元1059年）又委刘转运监修”，说明在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在云冈进行了延续十年之久的工程。这次工程主要内容，应是兴建“西京大石窟寺……凡有十名，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这十座大寺，大约都是后接石窟，前建木构的寺院。现存云冈崖面上部残存的大量大小梁孔椽眼，应是它们的遗迹。此外，13窟南壁下部佛龕座上曾发现辽代“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佛像的铭记，可知当时曾对佛像进行过修整。11窟西壁七立佛中的最后两尊（抗日战争时期已毁）、中心方柱南面的胁侍菩萨以及35窟东壁的释迦塑像和网目纹的石绿色背光，可能都是辽代的遗物。辽末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天祚帝由中都南逃天德军，途经云冈，金兵尾追，使上述十寺遭到破坏，造成了“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

金皇统初，由和尚禀慧主持，“重修灵岩大阁九楹”及附属建筑多间。这次工程，从“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二月起工，六年（公元1146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

明代以前有关云冈石窟的记载，都称作武州山石窟寺。云冈指武州塞的最高峰，云冈名称最早出现可能在明代。现存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重修云冈堡记》中说：“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于嘉靖□□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可知设置云冈堡在嘉靖二十七或三十七年，也就是一五四八年，或一五五八年，这是现在所知道的云冈名称的最早的记载。金代所修的灵岩大阁，据《永乐大典》所引《析津志》，在元末尚存。明代大同云冈一带再度荒废，寺院在明末毁坏后又曾重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大军进驻大同，三月留部将张天琳守云冈。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暴有力地扫荡了反动统治。但到了五月，当地地主武装勾结清兵在云冈进行血腥屠杀，云冈寺院建筑又沦为灰烬。